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张海鹏 主编

中国 近代 通史

ZhongGuo JinDai TongShi

第七卷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1924-1927)

王奇生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张海鹏 主编

中国 近代 通史

ZhongGuo JinDai TongShi

第七卷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1924-1927)

王奇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通史·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王奇生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214-09755-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1924~1927 IV. ①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 第 143168 号

中国近代通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张海鹏 主编

第七卷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

王奇生 著

责任编辑 彭晓路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奥能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87.125 插页 40

字 数 5435 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2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9755-2

总 定 价 800.00 元(共十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的形成	1
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	2
第二节 苏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早期接触	7
第三节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0
第四节 国共关系的初期形态	42
第二章 广州国民政府与南方军政格局	54
第一节 黄埔军校与党军的创始	55
第二节 大元帅府与革命基地的奠立	62
第三节 国民政府成立及其初步建制	69
第四节 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和军事	75
第五节 两广统一与革命基地的巩固	80
第三章 北京临时执政政府与北方军政格局	84
第一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86
第二节 临时执政政府成立	93
第三节 善后会议	100
第四节 国会的衰亡	108
第五节 国民军的崛起	114
第六节 军阀之间的循环混战	120
第四章 五卅运动与反帝高潮	132
第一节 反帝废约与国民会议运动	133
第二节 从惨案到运动	147

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对策	161
第四节 五卅运动的影响	169
第五节 省港大罢工	174
第五章 国共纷争:南方革命阵营的分化	179
第一节 弹劾共产党案	180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192
第三节 戴季陶主义	199
第四节 西山会议派	207
第五节 国民党二大与沪粤分裂	217
第六节 中山舰事件	223
第七节 整理党务案	232
第六章 北伐战争:北方形势与南方的胜利	246
第一节 北伐前夕的北方形势	249
第二节 国共对出师北伐的歧见	253
第三节 从广州到武汉	259
第四节 从南昌到沪宁	269
第五节 南北地域观念与宣传战	277
第七章 从迁都之争到宁汉分裂	294
第一节 迎汪复职运动	294
第二节 左派问题论争	305
第三节 迁都之争	312
第四节 南昌与武汉的对峙	319
第五节 “四一二”反共清党	325
第八章 南北三政权的鼎立	337
第一节 北京政府	338
第二节 武汉政府	348
第三节 南京政府	386
第九章 国共两党的组织形态	409
第一节 国共两党的党员构成	410

第二节 从“容共”到“容国”	426
第十章 急风骤雨:工农运动	447
第一节 工人运动	451
第二节 农民运动	476
第十一章 三大政党的“革命”观念及其政治文化	503
第一节 从“一党独革”到“多党竞革”	504
第二节 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518
第三节 “革命”与“反革命”	524
主要参考文献	537
人名索引	551

第一章 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两者均是中国人“以俄为师”的结果。从“师夷制夷”,到“取径东洋”,再到“以俄为师”,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榜样的又一次大转变。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宣布改组。所谓改组,主要是对外联俄容共,对内进行党务革新。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发动和主导了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这是中国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场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国民党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在野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崭露头角,由一个少数知识精英聚集的小团体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两党的宣传组织下,上千万工农群众被卷入到这场革命中。这在中国历史上亦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大革命实际只持续了两三年,而且其结局颇具吊诡意味:国共两党协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一举战胜了北洋军阀,结束了袁世凯以后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但两大政党亦以此为契机分道扬镳,并从此开始一场更为持久的军事内战和政治较量。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又走上了一条其革命对象所走过的老路,从而给共产党留下了新的革命发展空间。

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一个两极化趋向:一方面是军阀割据混战,社会祸乱相寻,政治极度失序;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异彩纷呈,新思潮汹涌澎湃,新生力量茁壮成长。正是这样一种看似歧异的矛盾格局,蕴育和催生了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

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国民党乃延续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和中华革命党(1914—1919)而来。自同盟会开始,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民曾对同盟会时期的“疏阔简易”情形有如下一番感慨:“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曾令闻者兴起,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①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国民党,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大批党员腐化变质,官僚政客群相涌入,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荡然无存,内聚力迅速消失。胡汉民描述当时的情形是:“长衫同志变成政客,武装同志变成军阀,同时军阀加入本党做武装同志,政客也加入本党做一般同志。”^②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很快被袁世凯分化瓦解。

孙中山每遇重大挫折时,常以“改组”、“改造”党为革新之契机。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主旨虽在讨袁,但是建立一个有强固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党,恢复民国前的革命精神,重订革命方略,开创革命新机,亦是孙中山的重要考量。但孙中山在组党方式上试图树立强人威权领导,并以封建会党的某些方式,如立誓约、按指

^① 胡汉民:《自传》,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

^② 胡汉民:《从国民党党史上所得的教训》,见《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3册,1236页,上海,民智书局,1932。

模、讲服从、分等级等来严密约束党员,将革命党引导到一条秘密、狭隘和排他性的组织道路,引起许多党人的疑虑和抵制。一批重要党人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实际运作效果亦距其理想甚远,其严格的组织形式妨碍了党势的扩张。加之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基地主要在海外,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相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反日运动中,革命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在护国之役前后,中华革命党并未能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①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移回上海。与此同时,孙中山为顾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逐步扬弃了中华革命党初期若干严格的党律,而采取较为宽松温和的组党路线,党组织又复松弛涣散。

1917年后,孙中山在广东进行护法运动,以武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论者一般认为这是革命党继辛亥之后为了维护民主共和所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奋斗。实际上,此时孙中山护法所依靠的是桂系与滇系军阀,党组织并没有发挥什么力量。当时一般人亦只知道有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革命党”本身鲜为时人所提及,^②表明此时革命党所显示的只有党魁个人之魅力,而少见党组织之群力。

由于“党力”不彰,与孙中山结合的西南地方军阀又并非真心拥戴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因为缺乏实力而被时人讥为无土地、无人民的“空头政府”和“超然政府”。当滇桂军阀不能容忍护法政府时,缺乏凭借的孙中山便不得不怏然离去,护法斗争宣告失败。经此失败,孙中山痛感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自叹“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由于对时局绝望,孙中山一度卜居上海,“暂不过问”实际政治,而潜心研究革命理论,继《民权初步》之后,又著《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三书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孙中山深感统一革命党思想理论之困难,提出“知难行易”

^①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② 吕芳上:《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国民党广州时期的发展(1917—1927)》,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308页,台北,1993。

学说。

孙中山探研革命理论之时,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孙中山自然不可能置身度外。翻检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有关批示、函电和演讲文稿,可知他对五四学生运动有过热烈的赞助,对新文化运动亦有敏锐的观察。爱国运动中,学生、工人、商人、妇女等民众纷纷组织起来,发挥了巨大的政治能量,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自叹不如。尽管一些革命党人积极参与和赞助了五四运动,但中华革命党并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姿态,对这场运动发挥领导和引导作用。1923年7月《前锋》杂志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①

1919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与各省、各都会的学生会联成一个严密的组织。这是当时任何团体、政党所不曾有过的。国民党虽是一个有相当历史的政党,但其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联络指挥,尚不如这个全国性学生组织的完备和运作灵活。此事对孙中山刺激甚大。如何健全党的机器,如何使党与民众结合起来,成为孙中山亟须应对的一个问题。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希望吸纳广大青年学生加入其革命阵营。但这次改组并没有改变原来革命党那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状况,亦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政纲。中国国民党设本部于上海,规定在各地设总支部、支部和分部,实际上各级地方组织只在海外华侨中部分建立,在国内仅广东建立支部,其他各省几乎无组织基础可言。

对于新文化和新思潮,孙中山及追随在他左右的重要革命党人的

^① 孙铎:《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523—52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反应如何呢？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孙中山命戴季陶、沈玄庐、孙隶三创办《星期评论》；同年8月，又命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创办《建设杂志》，参与新文化的激扬和新思潮的鼓吹。孙中山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潮，有表欢迎者，亦有持反对和保留态度者。如他对“文学革命”即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中国文字维系中国民族文化生命于不坠，不愿轻言放弃文言；同时他又认识到白话文是宣传主义的利器，故也不反对使用白话。除孙中山本人外，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叶楚傖、冯自由、汪精卫等国民党人也积极回应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参与新思想的介绍与研究。不过，这些国民党人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多是个体的活力，难见“党力”的整合。

1920年10月，孙中山利用各派军阀混战之机，命令陈炯明率原驻福建的粤军回师广州，逐走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并委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领导广东军政事务。孙本人亦重返广州。此时孙中山认为护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京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所以，必须建立正式政府。^① 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在广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不久，桂系投顺，孙设大本营于桂林，准备北伐，以打倒军阀，统一全国。

此次孙中山所依靠的力量本是陈炯明指挥下的党军。这支部队是孙中山从桂系手中夺过来的，是第一支真正属于国民党的部队。孙中山视之为难得的革命武力，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入党，期望这支“党军”能达成革命任务。陈炯明原是向孙中山宣过誓、摁过指印的党员。^② 孙对陈倚畀至深。未料陈炯明为保存实力、巩固地盘，反对孙中山北伐，并于1922年6月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陈炯明的背离，使广东革命事业毁于一旦。“变生肘腋”，使孙中

^① 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下册，817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69。

^②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3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山有刻骨铭心之痛：“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①这一事件，使孙中山感到迫切需要一个严密组织的革命党和一支真正服膺主义的党军。

在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的党机器，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据鲍罗廷^②描述，改组前的国民党，“党与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中山)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完全不存在。”改组前，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余万，实际多为“挂名党员”。如国民党广州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其中缴纳党费的只有6000人，前来登记者只有3000人。“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的工人对政府的命运漠不关心，对其胜败根本不感兴趣；城市小资产阶级因前线时胜时败和敌军经常进犯而深受无政府状态之苦；滥征捐税，招致商人不满和仇视；至于农民，“他们把孙同陈的斗争看做是只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国民党“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国民党又沉睡一年又一年。”^③

这样一个党，显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改组和改造了。

① 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5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鲍罗廷（1884—1951），俄罗斯人，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3年8月被俄共中央政治局派遣来华做孙中山的政治顾问，1927年7月回莫斯科。

③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367—370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第二节 苏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早期接触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①，其实力远不能和西方列强相比，然而苏俄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却很快超过了英、美和日本，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晚清以来，西方列强既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所要抵制和反抗的对象，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所要学习和仿效的榜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人的学习榜样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给中国知识分子以莫大的刺激。中国知识精英在对西方列强藐视公理愤恨的同时，也对欧美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怀疑。值此之际，苏俄政府适时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人闻之，备感兴奋和鼓舞。举国上下，洋溢着浓郁的“友俄”氛围。知识界更是交相赞颂，称许苏俄的举动“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为世界外交上树立了未曾有的模范”，“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因为这空前的事业，实在是自有国家这个东西以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不愿做，不能做，不敢做的；又实在是今天全世界的平民，所大家希望的”。^②

在对苏俄满怀感念的同时，社会主义思潮亦在中国知识界汹涌澎湃。当时《东方杂志》记曰：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另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22年底成立后，中国人习惯上仍称之为“俄国”或“苏俄”，称“苏联”者少。本书除引用原文时照原文称呼外，一般情况下称“苏俄”。

②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答复牒》，见1920年4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对苏俄对华宣言的答复文》，见1920年4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义》，载《星期评论》第45号，1920年4月1日。

一年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①

五四时期的刊物,很少有不谈社会主义的。《东方杂志》在当时算是一个保守的刊物。1921年,连《东方杂志》也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译注刊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如此流行,自然与俄国革命的胜利有直接关联。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救国无门之时,把俄国革命,从一个专制统治下的落后国家,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先例,视作中国前途的希望所在。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来自西方又批判西方,并申言能解决西方问题的思想,自然容易深入人心。这个时期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并不限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国民党人中亦不乏热衷者。如胡汉民、戴季陶、徐苏中、林云陔、冯自由等均是。尤其是胡汉民、戴季陶,不仅阅读、翻译,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方法(如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问题。^②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由“友俄”发展到“联俄”、“师俄”,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孙中山晚年的联俄政策,是其40年革命生涯中的重要决策之一。孙中山的对俄态度,在欧战前后,有明显的转变。欧战期间,他曾深以战后俄国可能进取中国为虑。但当俄国战败、十月革命发生后,孙很快断定俄国有可以为友的条件,并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晚于辛亥革命6年,孙中山乐于将中俄两国革命的情形作比较,并密切关注俄国政情的变化,初以俄国革命受中国革命影响而自喜,继又反思何以俄国革命能迅速成功,而中国革命的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孙将俄国革命的理想和中国革命的目标等量齐观,故而对俄国革命抱有亲近和同

^①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判》,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4期,1921年2月。

^②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289—32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情之感。这当是孙中山联俄的心理基础。

孙中山联俄的另一因素,是其对革命过程的现实考量。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为了达成其革命目标,向来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和外交手腕。在此之前,孙一方面愤恨列强欺凌中国,一方面又不断谋求与列强结盟,希图从列强那儿寻求道义的支持与物质的援助。同样,孙一方面斥责军阀为中国祸乱之源,另一方面又时常与此派或彼派军阀合纵连横。孙中山联俄亦不无政治谋略的运用。

1920年9月,孙中山派李章达前往苏俄,代表他本人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1921年春进兵中国新疆、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李章达直到次年春天才抵达莫斯科。^①此时苏俄政府也开始在中国寻求支持和合作者,故对孙中山的这一建议,最初的反应比较积极。但未久,孙中山因重回广州组建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为争取国际社会亦即列强的承认,孙中山放弃了寻求苏俄援助的初衷。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②于1921年12月间前往桂林、广州同孙中山接触时,孙明确表示,他目前不能同苏俄公开结盟,担心过早联俄会招致列强的干涉。^③甚至到1922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接见新任“赴俄全权代表”张秋白时,苏俄方面尚不清楚孙中山是否愿意与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孙中山刚刚建立起来的广东根据地毁于一旦。孙痛心疾首之余,复而再度寻求苏俄援助。党内同志,如蒋

① 关于李章达赴苏,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载《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台北,1991。

② 马林(1883—1942),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4年参与发起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共产国际成立后,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马林被委派为驻中国的代表,于1921年4月从欧洲前往中国,6月抵达上海后,具体帮助和指导中国建立共产党,并出席了中共一大。随后,马林又开始与国民党人接触,并促成和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10月回莫斯科。

③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见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73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介石等,亦力主联俄。恰当此时(8月26日),苏俄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①致函孙中山,希望与他建立密切关系,并就与张作霖的关系等问题,探询孙的态度。未久,越飞再次致函孙中山,并派军事参赞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此时苏俄的对华政策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希望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一方面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设法维护沙俄时代取得的一些在华权益。苏俄希望北京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但北京政府在持续两年的对俄交涉中一直过于重视列强的态度,并在蒙古、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不愿做出让步。由于吴佩孚在当时中国的军阀中颇有“开明”的声誉,又早与苏俄有过接触并表示“亲俄”之意向,且以反对苏俄在远东宿敌日本著称,故在苏俄看来,若以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同吴佩孚的军事力量相结合,建立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当是最佳的选择。^②但此前孙中山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已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付直系的吴佩孚。苏俄试图促成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反对张作霖。因张作霖的亲日背景,苏俄视之为敌人。越飞曾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放弃联张反吴的策略。孙中山则希望苏俄援助他建立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中国的统一。孙打算在中国西北创立军事基地,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希望俄国提供武器和物资。在与国内实力派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吴佩孚“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而“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孙表示会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但不会同张作霖决裂。^③事实上,即使在越飞开始同孙中山建立联系,并极力劝说孙吴合作的时候,孙与段、张之间仍在继续磋商共同反对吴佩孚的军事计划并付诸实施。越飞与孙中山,显然各有所图。

越、孙两人在策略上虽有歧见,但基本目标尚无大的冲突,故双方

① 越飞(1883—1927),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俄国人,1922年7月,被苏俄政府任命为驻中国全权特使,与中国北京政府谈判。越飞来华后,一面与北京政府公开开展外交活动,一面与南方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进行秘密联系。

② 邱捷:《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载《近代史研究》,1998(3)。

③ 《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34—13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各派代表继续沟通。越飞锲而不舍地在孙中山和吴佩孚之间进行调解,无奈孙、吴双方均无合作诚意。孙、吴的敌对关系,并非因两人的性格、观念之歧异所致。吴佩孚当时颇有“好军阀”的声誉,许多人的心理都深恶奉系,左袒直系。孙中山联奉倒直,实与一般国人的心理相反。舆论甚至认为孙中山“联络张胡子去打吴秀才,未免近于倒行逆施”。而在孙中山看来,直系吴佩孚是当时各军阀中最强横的一个,而且控制中央,直接威胁自己的革命事业;南方反对孙中山的军阀如陆荣廷、陈炯明等都是直系军阀的同盟者或受直系的支持,“擒贼先擒王”,要打倒军阀,便要先从打倒直系下手,奉系既能俯就,不妨暂时与他合作。^①虽然苏俄方面通过各种办法希望孙中山改变联张反吴的策略,但孙中山始终不为所动,反而一再要求苏俄改变对张作霖的态度,劝说苏俄不要在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冲突中支持前者。

在调解孙、吴合作前景渺茫的情况下,苏俄面临在中国几大政治和军事实力派人物中作最后选择的问题。孙中山从1922年10月开始的旨在恢复南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进展。这使孙在苏俄对华政策中的地位变得愈益重要。大约在1922年底1923年初,越飞开始由助吴联孙,转向弃吴联孙。越飞预期孙中山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北京政府之外的中国的统治者,而吴佩孚所控扼者,仅为河南一省和北京周边一小块地区而已。因此,越飞申言:“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谁是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我们应该跟谁打交道。”^②

1923年1月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议,采纳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1月17日,越飞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正式谈判。谈判的结果,双方达成一项至关重要的协议,此即有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和苏军暂时驻扎外蒙古,越飞则承诺孙中山“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并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

①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②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13日),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97页。